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Li Ba's Emphasis on Education

Jinpu Lai

Jianwei Li Ba Research Association, Leshan, Sichuan, 614400, 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ideological system of Li Ba, a diligent official in the Qing Dynasty, were deeply rooted in his rich experience in local governance and profound Confucian cultural cultivation. Its core direction was a profound criticism and rational reflection on the materialistic educational atmosphere of "learning from luxury" prevalent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This article takes precious inscriptions such as "Xiu Fuding County School Record" as the core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combines contemporary localized education practice cases in Ningde, Jianwei and other places to systematically reveal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Li Ba's educational thought that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Li Ba's ideas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current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apit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 decline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the crisis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ducation governance civilization" constructed by it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al thinking of local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historical coordinates and sources of wisdom for building a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rooted in the land of China. By reorganizing and interpreting Li Ba's educational thought,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rame from the depths of history for contemporary education reform, demonstrating the vita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thought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localized education; Confucian educ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李拔重视教育的思想根源与当代价值

赖金普

犍为李拔研究会, 中国·四川乐山 614400

摘要

清代循吏李拔的教育实践与思想体系,深植于其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与深厚的儒家文化修养之中,其核心指向是对乾嘉时期盛行的“学舍竞奢”物质主义教育风气的深刻批判与理性反思。本文以《修福鼎县学记》等珍贵碑记文献为核心史料,结合当代宁德、犍为等地的在地化教育实践案例,系统揭示了李拔教育思想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研究表明,李拔的思想对于破解当前教育资源资本化、人文精神式微、文化认同危机等现实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构建的“教化-治理-文明”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不仅为理解清代地方官员的经世致用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构建扎根中国大地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坐标与智慧源泉。通过对李拔教育思想的重新梳理与阐释,本文旨在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一份来自历史深处的参照系,论证了传统教化思想在现代转型中的生命力与适应性。

关键词

在地化教化; 儒家教化; 当代价值

1 李拔教育实践的背景与独特性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清代乾嘉时期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相对繁荣,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书院建设达到高峰,但同时也伴随着功利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潜滋暗长。李拔(1713-1775年)作为清代乾隆年间的一位杰出地方官员,其教育实践与思想显得尤为独特且珍贵。他不仅是一位行政官员,更是一位深谙教化之道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时代性,是清代中期儒吏治理思想的典型代表。

【课题项目】立项号“乐山市社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SkL2025D130号”。

【作者简介】赖金普(1952-),男,中国四川乐山人,中教高级,从事清代教育史,巴蜀地区传统教化思想研究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整理研究。

李拔(1713-1775),四川犍为县城文林街人,字靖峤(亦字清翹),号峨峰,出身贫寒。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历任湖北钟祥、长阳、江夏知县、汉阳府同知,均有政绩。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李拔从湖北汉阳府同知擢升福宁知府,在福宁治城垣、修水利、劝农桑、兴教化,做了许

多有益百姓的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五月李拔从福宁调任福州知府兼理海防,以治理福宁的成功经验治理福州。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任湖南长沙知府,倡议捐俸维修岳麓书院。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任湖北荆宜施道台,管辖荆州、宜昌、施南(恩施)等地,兼管水利事业。他在任职期间,对长江三峡航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并留下大量题刻。李拔由于政绩卓著,各地争抢,五次被乾隆皇帝召见,慰勉有加。至今福建闽东一带还誉称李拔为“一代循吏”,江汉称其为“李青天”。岳麓书院的山长旷敏本,为李拔写墓联,称其:“泽溥东南深得民情爱戴,学宗廉洛直探道统渊源。”^③这一评价精准地概括了李拔的一生:既有惠民的政绩,又有深厚的学术渊源。

李拔著述颇丰,先后撰有《重修犍为县志》9卷、《衢州续艺文志》44卷、《长阳县志》8卷,著有《四书旁注》《困学新传》《史学概论》《东西行录》《壮游见闻》《纲鉴折衷》《离骚解意》《读史绪论》《地理学探源》《东溪文集》《行部纪略》《道香园诗集》及家训家教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底,更记录了他对于社会治理与教育发展的深刻思考。他的文字朴实无华,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反映了他务实求真的人格特质。

李拔倾注毕生心力兴办教育、修缮学宫。他写的《重修犍为县学记》《重修福宁学宫记》《修福鼎县学记》^①《罗川书院记》《福安书院记》《宁德学宫记》《钟山书院记》《道统渊源考》《劝学箴》《辩志论》《教学琐言》凸显了他无论在何地为官,都始终将重教兴学作为重要使命。他的君子治学“是以沉静之心养学识,以清澈之念守正道,以通达之智明事理,以坚定之志践初心。”^①等相关论述,给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修福鼎县学记》^①等碑记文献,为我们理解其教育理念提供了关键文本。李拔的教育实践并非孤立的行政举措,而是其整体治理思想与儒家文化修养的重要体现。他不仅仅是一位行政官员,更是一位深谙教化之道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时代性。他将教育视为治理的根本,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民风,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2 乾嘉时期教育风气与李拔的批判立场

李拔活跃的乾嘉时期,江南地区书院建设达到高峰,徽商巨贾竞相捐资兴建学舍,形成一股“学舍竞奢”的风气,追求“楼观争胜”的物质排场。这种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及地方士绅对教育的重视,但同时也暴露了教育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异化现象。当教育设施的豪华程度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当捐资建学的动机掺杂了过多的炫耀与功利色彩,教育的本质便面临着被遮蔽的风险。这种风气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更可能导致教育内容的空心化,使得士子们过于关注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内在修养与学问的真谛。

然而李拔对教育的重视,恰恰建立在对这种流于形式的物质主义崇拜的深刻反思之上,展现出与时代主流迥异的批判性立场。他并没有盲目追随当时盛行的修建豪华学舍的风潮,而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关注教育的实质内容与实际效果。这种批判立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他对儒家经典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在多地任职期间对民情社风的细致观察。他深知,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在于化民成俗,而不在于建筑的宏伟与装饰的华丽。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前瞻性,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他敢于在众声喧哗中提出不同的声音,体现了作为一名儒吏的担当与勇气。

3 李拔教育思想的核心议题与当代关联性

李拔的教育观聚焦于几个核心议题:对教育本质的探寻(祛魅物质主义,回归精神内核);对士人精神向度的塑造(“去私近圣”的双向运动);以及实现教育价值的根本路径(“在地化教化”与“知行合一”)。这些议题不仅是对当时教育积弊的回应,更因其触及文明传承的深层逻辑,而在当代面临教育资源失衡、人文精神式微、文化认同危机、知行脱节等挑战时,焕发出强烈的现实关联性和启示价值。

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教育领域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教育资源的资本化倾向日益明显,部分地区和学校过度追求硬件设施的豪华,忽视了软件建设与内涵发展;人文精神在功利主义教育的冲击下逐渐式微,学生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有待加强;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文化同质化风险,使得地方文化认同面临危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教育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实际能力。李拔的教育思想,恰如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当代教育的种种困境,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智慧线索。他的思想不仅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与未来,为我们应对当代教育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本文旨在系统剖析李拔重视教育的思想根源,阐释其教育理念的核心特征与实践路径,并深入探讨其超越时空的当代意义。通过对李拔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清代地方治理与教育发展的互动关系,更能够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体系。我们希望通过与李拔思想的挖掘,能够唤醒社会对教育本质的重新思考,推动教育回归育人的本真。

4 祛魅与重构:对教育物质主义的理性批判与本质回归

李拔重视教育的首要认知根源,在于他对教育物质载体的过度崇拜有着清醒的批判,对教育本质的回归有着坚定的重构。在乾嘉时期那个物质主义逐渐抬头的时代,李拔能够保持如此清醒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他的思想不仅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纠正,更是对教育本质的一次深刻回归。他

试图透过物质的表象，看到教育的灵魂，这种洞察力源于他深厚的儒家修养和丰富的治理经验。

4.1 批判“焕乃宫墙”：超越物质载体的教育观

4.1.1 乾嘉时期“学舍竞奢”风气的背景与成因

乾隆年间，伴随经济发展（尤其是江南地区），书院、县学的修建往往追求宏大的建筑规模和精美的装饰，徽高等地方富绅的捐资也常以建造壮观的学舍为荣，形成一种将教育投入等同于物质设施建设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一方面，清代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地方士绅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希望通过捐资助学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声望；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盛行使得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关键渠道，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关注度空前提高，修建豪华学舍被视为重视教育的直观表现。此外，地方官员也往往将修建学宫作为政绩工程，以此来展示自己的治理能力和对文化的重视。

然而，这种风气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过度追求物质设施，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受到限制；同时，也容易导致教育内容的空心化，师生过于关注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内在修养与学问的真谛。在这种背景下，李拔的批判显得尤为尖锐且必要。他看到了这种风气背后的隐患，担心教育会变成一种炫耀的工具，而不是育人的场所。他的批判不仅是对现象的描述，更是对本质的揭示。

4.1.2 李拔对福鼎县学完备规制的独特反思

当李拔目睹福鼎县学“寝殿门庑，亭阁斋厨”规制完备时，他并未沉溺于对建筑规模的赞叹，而是敏锐地直指“焕乃宫墙”表象之弊。他在《修福鼎县学记》^①中明确表述：“仁厚见于行事，观感成为风俗，此多士为善于乡之明效也。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诚斯之谓乎？虽然，所谓学者非徒破厥慳吝，焕乃宫墙而已。”显示出他对当时普遍风气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精神。

这段文字深刻地揭示了李拔的教育观。他认为，教育的真正效果体现在人们的行事作风与社会风俗的改善上，而不是体现在建筑物的华丽程度上。“焕乃宫墙”虽然重要，但仅仅是教育的外在载体，而非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只注重外在形式的华丽，而忽视了内在精神的培育，那么教育就失去了其根本意义。李拔的这种反思，不仅是对福鼎县学建设的指导，更是对当时整个教育界的一种警示。他提醒人们，不要被物质的表象所迷惑，要始终关注教育的本质与核心。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实效，而不是形式，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2 揭示教育本质：精神丰盈高于物质堆砌

4.2.1 “非徒破厥慳吝”的核心论断与深层含义

李拔提出“非徒破厥慳吝”的论断，一针见血地指出，兴办教育的目的绝非仅仅是为了让人们破除吝啬之心、捐出钱财，更核心的价值在于精神的涵养与教化。比如地方修建学宫、书院，若只追求殿宇宏伟、屋舍气派，却不重视师长

传道、学子修身、民风教化，那再华丽的建筑也只是空壳；唯有以学问润心、以礼义育人，让百姓知礼向善、士子明志笃行，才是教育真正的意义。

这一论断触及了教育投入的根本目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捐资助学往往被视为一种积德行善的行为，但李拔指出，这种行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财富的转移，更在于通过这一过程激发人们的仁爱之心与社会责任感。如果捐资仅仅是为了炫耀财富或获取名声，那么这种教育投入就失去了其道徳意义。李拔强调，教育投入应当服务于精神的成长与社会的进步，而不是成为物质炫耀的工具。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内涵建设，而不是外在包装，这种思想对于当代教育投入的评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2.2 对教育投入效益的重新定义与评估标准

他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宫墙之巍峨壮观，而在于其所能培育的精神之丰盈与人格之完善。对教育投入效益的重新定义：李拔的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对教育投入效益评估标准的根本性重构。他引导人们关注教育投入的精神产出和社会效益，而非仅仅停留在物质设施的规模上。

在现代教育评价体系中，往往过于注重硬件设施、升学率等量化指标，而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精神成长。李拔的思想提醒我们，教育效益的评估应当更加多元化，应当关注教育对学生人格塑造、道德提升以及社会风气改善的实际贡献。只有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才能引导教育事业健康发展，避免陷入物质主义的误区。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长远效益，而不是短期政绩，这种思想对于当代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4.3 士民义举的印证：从物质贡献到精神释放

4.3.1 福鼎邑人公益实践与儒家“仁者以财发身”

李拔的思想在其治理实践中得到了有力印证。他观察到福鼎士民自愿承担“城池桥道”等公共事务。这种超越简单物质贡献的公益行为，在李拔看来，正是儒家“仁者以财发身”（《大学》）理念的生动实践——有德行的人运用财富来修养自身、成就德行。

在福鼎的治理过程中，李拔发现当地士民不仅愿意捐资修建学宫，还积极参与其他公共事务的建设。这种行为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深厚的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李拔认为，这正是教育教化的成果。通过教育，人们不仅掌握了知识技能，更培养了仁爱之心与担当精神。这种精神的释放，比单纯的物质贡献更为宝贵，它是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动力。他看到了民众身上的潜力，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激发这种潜力，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4.3.2 李拔对公益精神实质的升华与教育价值回归

李拔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背后的精神实质，并将其升华，视为教育价值实现的典范。他认为，真正的教育投入，其终极旨归应是激发和促进精神能量（如仁爱之心、公共责任感）的持续释放，成为社会向善的催化剂，而非仅仅是财

富数字的简单堆砌或物质设施的炫耀。这种认知，有力地颠覆了当时盛行的“学舍竞奢”式功利主义教育观，为教育回归其精神性本质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注脚，也为后世思考教育投入的效益指明了方向——教育最终应服务于人的精神成长与社会道德的提升。

李拔的这一思想，对于当代公益事业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当今社会，慈善捐赠与社会公益日益增多，但如何确保这些投入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李拔的思想提醒我们，公益事业不仅仅是资金的流动，更是精神的传递与价值的塑造。只有注重精神层面的引导与培育，才能使公益事业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他主张教育应当与公益相结合，通过教育来提升公益的品质，通过公益来验证教育的成果。

5 道德内核与实践路径：“去私近圣”的双向运动与“在地化教化”

李拔教育观的深刻革命性，在于他将儒家“去私近圣”的理想，解析为一种动态的、双向的精神建构过程，并通过“在地化教化”将其付诸实践。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更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为清代地方教育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路径。他将抽象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使得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人格的塑造。

5.1 “去一己之私”：个体道德的净化与经世担当

5.1.1 突破“高尺寸之义”的局限与格局拓展

李拔要求士子突破“高尺寸之义”的狭隘格局。这里的“高尺寸之义”意指局限于个人小圈子或琐碎细节的道德标榜，缺乏宏大的社会关怀和担当。在传统社会中，部分士人往往满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忽视了社会责任与民生疾苦。李拔认为，这种狭隘的道德观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士人应当具备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厚的担当。

他鼓励士人走出书斋，关注社会现实，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这种思想突破了传统儒学中可能存在的避世倾向，强调了儒家的经世致用精神。李拔认为，真正的道德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的言行举止上，更体现在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对民生疾苦的关怀上。他主张士人应当成为社会的脊梁，承担起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

5.1.2 批判乾嘉考据学脱离现实的积弊与学术导向

这种批判锋芒直指乾嘉考据学可能陷入的积弊。李拔观察到，部分学者埋首故纸堆，醉心于文字训诂、版本校勘，将学术异化为脱离现实社会需求的纯粹知识游戏或智力炫耀，忽视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核心价值。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虽然在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脱离实际、忽视现实问题的倾向。

李拔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服务社会、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

他倡导士人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相结合，通过学术研究来提升治理能力，通过治理实践来验证学术成果。这种思想对于纠正当时学术界的不良风气，推动学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主张学术应当服务于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这种思想对于当代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5.1.3 重构“士好仁而民归仁”的价值传导链与社会责任

针对此弊，李拔以“士好仁而民归仁”的连锁效应，清晰地重构了教育的价值传导链条：士人个体道德的自觉净化与提升（“去一己之私”“好仁”），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其高尚品格与济世情怀（如仁爱、公正、担当），应如涟漪般扩散，率先垂范，影响和引领整个社会风尚的改善（“民归仁”），最终实现“民归仁”的治理目标。这强调了士人作为道德楷模和社会引领者的双重角色，其个人修养必须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

这一价值传导链的构建，体现了李拔对社会治理规律的深刻理解。他认为，社会的良治始于士人的修身，士人的道德水准直接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因此，教育的重点应当放在士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上，通过士人的示范作用，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这种思想对于当代师德建设与学生德育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道德的传导，通过个体的修养来影响群体，通过群体的改善来实现社会的进步。

5.2 “近圣人之居”：价值坐标的建构与经典具象化

5.2.1 追求“升其堂，入其室”的学问境界与精神归宿

“近圣人之居”则强调为学者树立崇高的价值标杆和精神归宿。李拔引导学者追求“升其堂，入其室”的境界，即不仅要了解圣贤思想的门径（升堂），更要深入其精神内核（入室），达到学问与道德修养的圆融统一。这一要求不仅是对学问深度的追求，更是对精神境界的提升。

李拔认为，学习圣贤之道，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知识的掌握上，而要深入理解其精神实质，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与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近圣人之居”的境界，成为具有高尚品德与深厚学问的君子。这种思想对于当代教育中如何处理好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精神的升华，通过学问的修养来提升人格的境界。

5.2.2 福鼎实践：经典文本镌刻与“文化基因工程”

在福鼎县学的实践中，李拔将这一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他将《寻孔颜乐趣说》③《辨志论》等阐发圣贤精神（尤其是安贫乐道、志向高远）的篇章镌刻于学宫墙壁。这一举措使抽象的圣贤思想转化为可触可感、朝夕相对的文化符号，融入学子的日常学习环境。这种“经典具象化”策略，与现代“文化基因工程”的理念不谋而合，即通过具体的物质载体（如碑刻、建筑、环境布置）和环境熏陶，实现核心

价值观的隐性传播、浸润与代际传承，让圣贤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李拔的这一做法，巧妙地利用了环境育人的功能。通过将经典文本镌刻于墙壁，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能够随时接触、阅读和思考，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圣贤精神的熏陶。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成本低廉，而且效果持久，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教育智慧。对于当代校园文化建设，李拔的这一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可以通过校园环境的设计与布置，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环境的熏陶，通过环境的感染来提升学生的素养。

5.3 “在地化教化”：知行合一的文明存续之道

李拔将教育的意义提升至文明存续的战略高度，其核心路径便是“在地化教化”。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李拔对教育功能的深刻理解，更展现了他对地方社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他将教育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使得教育成为推动地方进步的重要力量。

5.3.1 “处为正士，出为良臣”的双重使命定位与人才标准

他以“处为正士，出为良臣”确立了士人双重使命的价值定位。所谓“处为正士”，是强调士人在未仕、居乡之时，仍须修身立德、守道持正，成为乡里表率与道德标杆；“出为良臣”，则指士人出任任事之后，须以民为本、恪尽职守，成为有益于国家与百姓的贤明官吏。这一定位将修身立德与致用济世统一起来，既重内在品格，又重外在事功，显著超越了传统“学而优则仕”偏重仕途进取的单一功利导向，构建起更为完整、更具道义担当的士人成长理想。

这一人才标准的确立，打破了传统教育中唯仕途论的局限。李拔认为，无论士人是否出仕，都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未仕时，要做乡里的道德表率；在出仕后，要做百姓的贤明官吏。这种双重使命的定位，使得教育培养目标更加全面，也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对于当代人才培养，李拔的这一思想启示我们，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更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担当，使其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人才的全面发展，通过全面的培养来满足社会的需求。

5.3.2 超越“学而优则仕”的在地关怀与闭环构建

这一定位构建了一个“在地化教化”的完整闭环：培养的人才，首先要在其生长生活的乡土社会中成为道德表率，身体力行地教化乡里，端正风俗，为地方树立道德典范（“处为正士，可训俗而型方”）；同时，当他们有机会出任官职时，则应具备经世致用的真才实学，能够运用所学造福一方百姓，促进民生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出为良臣，可阜物而誠民”）。这种定位凸显了强烈的“在地性”关怀，要求教育成果必须回馈和服务于地方社会。

这一闭环的构建，确保了教育与地方社会的紧密联系。

教育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晋升，更是为了地方的发展。通过培养具有在地关怀的人才，可以有效促进地方社会的治理与发展。这种思想对于当代地方高校的定位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地方高校应当扎根地方，服务地方，培养能够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地方的需求，通过服务地方来实现教育的价值。

5.3.3 福鼎实践：种桑养蚕技术与儒家思想的在地转化

这种“在地性”在福鼎县学的办学实践中体现为教育内容与地方需求的深度融合。为了达到深度融合，李拔根据福鼎县在内的福郡地区（今福建省宁德市）五个县的生态状况，写了《请教民开山种树议》^②。宁德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邱树添先生主编的《奋力谱写“宁德篇章”研究2025卷》^④介绍：“《请教民开山种树议》^②主要讨论了宁郡地区的山林资源开发和保护问题。”李拔在《请教民开山种树议》^②中指出：“宁郡地区虽然山高林密，但近年来，由于过度砍伐，木材和柴薪的价格飙升，甚至出现了山林荒芜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官山的管理不善，以及人们对山林资源的短视利用。”针对这种情况，李拔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禁止无节制地砍伐，保护山林资源；二是开发荒山，利用荒地种植树木；三是允许民众认垦官山，自行种植和收获，以增加木材和柴薪的供应；四是对于有主之山，鼓励广泛种植松、杉、竹、桐、茶等树木，以获取长远利益；五是严禁擅自砍伐，以保证山林的可持续发展。”用本土资源教化当地百姓，使百姓生活富足，是李拔在特定地域“在地化教化”的生动实践，也是他将儒家的仁政理想，转化为具体惠民行动的“知行合一”举措。

李拔的这一实践，充分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他不仅关注学生的道德修养与学问知识，更关注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撰写《种树说》^②《种棉说》^②《蚕桑说》^②，教授种桑养蚕、开山种树等技术，不仅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社会责任感。这种教育模式，对于当代职业教育与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教育应当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实践的培养，通过实践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5.3.4 物质载体作为“记忆之场”与文化基因传承

福鼎县学中的碑刻（如《修福鼎县学记》^①、《寻孔颜乐趣说》^③《辨志论》等）、坊表、甚至学宫建筑本身，在李拔的设计中，都成为承载和传播这种地方化知识与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些物质实体构成了文化传承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⑥，使士民在日常观瞻、使用与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触、理解、内化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圣贤教诲、地方历史、道德规范、实用知识），从而完成文化基因的复制、内化与在特定时空下的创新性发展。

李拔通过对物质载体的巧妙利用，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些碑刻与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

载体。它们承载着李拔的教育思想与治理理念，通过代际传承，影响着后世的人们。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对于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重视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使其成为传承文化、教育后人的重要资源。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文化的传承，通过文化的传承来实现文明的延续。

6 超越时空的启示：李拔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李拔的教育哲学，其永恒魅力在于深刻触及了文明传承的核心逻辑。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知识生产与教育形态的今天，重读其思想，可发现其在三个关键维度上对当代困境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和启示性。李拔的思想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与未来。

6.1 批判性启示：映射当代教育困境

6.1.1 “宫墙竞高” vs. 教育资源资本化与失衡

李拔对教育设施竞奢的批判，尖锐地映射当代教育领域可能出现的资源过度向物质条件（如豪华校舍、昂贵设备）倾斜、教育投入效益评估的异化（如过度追求硬件指标排名）、以及由此加剧的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城乡间、校际间分配严重不均等问题。他提醒我们，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精神培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物质条件应为这一目标服务，而非成为目的本身或加剧不平等的工具。

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硬件设施日益改善。然而，我们也看到，部分地区和学校过度追求豪华校舍与先进设备，忽视了师资建设与内涵发展。这种倾向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李拔的思想提醒我们，教育的发展应当注重内涵式发展，避免陷入物质主义的误区。我们应当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师资培养、课程改革与学生发展上，真正实现教育的公平与质量提升。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公平的实现，通过公平的实现来促进社会的和谐。

6.1.2 “去私近圣” vs. 工具理性侵蚀人文精神

李拔强调道德净化、价值引领（“近圣”）和经世情怀，直指当代教育可能面临的深层危机：在过度强调技能培训、就业率、升学率（工具理性膨胀）的浪潮下，人文精神的培育、社会责任感的涵养、批判性思维的塑造、以及超越个人功利的价值追求（如对真善美的向往、对社会的关怀）容易被边缘化。其思想启示我们，教育必须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⑦，在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更要注重塑造健全人格、崇高价值追求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抵御工具理性对教育本质的异化。

当前教育中，功利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学生与家长往往过于关注升学与就业，而忽视了人格的完善与精神的成长。这种倾向导致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创新能力，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李拔的思想提醒我们，教育的根本在于立德树人。我们应当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价值追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批判性思维，使其

成为具有健全人格与深厚底蕴的现代公民。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人格的塑造，通过人格的塑造来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

6.1.3 “在地化教化” vs. 文化认同危机与教育同质化

全球化浪潮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文化认同的模糊、地方特色的消退以及教育模式的趋同化（如统一课程标准、评价体系对地方特色的挤压）。李拔将“在地化”作为连接教育理想与现实、实现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路径，为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本土化解决方案。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教育模式也日益趋同。李拔的“在地化教化”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保护地方文化、特色发展的路径。我们应当重视地方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将其融入教育体系中，培养学生的地方认同与文化自信。同时，我们也应当鼓励教育模式的多样化发展，避免“一刀切”，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特色的发展，通过特色的发展来提升教育的竞争力。

6.2 “在地化教化”路径的多元当代价值

“在地化教化”作为李拔思想的核心实践路径，其当代价值尤为凸显，并在多个层面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一路径不仅适用于历史研究，更适用于当代教育实践。

6.2.1 对教育发展的意义

（1）驱动地方高校特色发展

“在地化”是地方本科院校破解同质化困境、实现转型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它要求高校扎根地方，深度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地方独特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支柱产业融入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科学研究方向和社会服务体系。这不仅能解决“办学定位在地”与“办学实践脱域”（脱离地方实际）的矛盾，更能形成不可替代的办学特色和核心竞争力。如福建宁德师范学院开设闽东文化选修课，编写乡土教材；在社区“文化驿站”定期举办传统技艺工作坊，让市民在体验中建立文化认同。

地方高校应当明确自身的定位，避免盲目追求综合性与研究型，而应当立足地方，服务地方。通过与地方产业、文化的深度融合，形成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这不仅有助于高校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地方社会的进步。宁德师范学院的做法，为其他地方高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主张高校应当注重特色的形成，通过特色的形成来提升高校的影响力。

（2）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与效能

对于乡村学校而言，在地化课程与教学（如利用当地自然景观、历史遗迹、民俗文化、特色产业设计跨学科项目或主题教学活动），是推进乡村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重要抓手。它能帮助乡村学生更有效地达成国家基础性教育要求，同时充分利用在地资源，降低教育成本，提升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它能促进乡土知识的活化应用与乡土文化的传承创新，培养乡村学生关注、理解、热爱并思考如何参与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素养与能力，培养

“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如：四川省犍为县中小学校的在地化课程实践，便为这一理念提供了生动注脚。学校立足于古韵犍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生态农业等特色产业，开发了“茉莉茶艺文化探源”“岷江生态守护者”“诸葛亮铁山治练兵器的自然场景”等跨学科主题课程。特别是四川犍为一中，这所百年名校，早在2005年就编写了《高中生人文读本》⑤乡土教材，语文课上，老师讲解《犍为之歌》，带领学生《穿行在历史深处的犍为》，走访耆老收集犍为文庙千年兴衰、罗城古镇百年移民、嘉阳小火车“工业革命”的故事，将语言文字训练融入乡土叙事的书写与创编。数学课上，学生丈量古建筑梁柱比例、测算农作物生长周期，让抽象的数理化知识对接家乡的空间与生态实景；科学课以岷江水质监测、候鸟迁徙观察为核心，引导学生开展在地化的探究性学习；美术课与劳动课则联动非遗传承人与茶园农户，让学生在临摹木雕纹样、体验树皮造纸、参与茶叶采摘制作的过程中，完成审美素养与劳动技能的双重培育。从他们试行“在地化教化”的实践效果看，这一课程模式并未脱离国家课程标准的框架，而是以在地资源为载体重构学习场景，不仅省去了远赴城市场馆开展研学的高额成本，更让原本枯燥的课堂知识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乡土体验，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更为深远的价值在于，增强了学生熟悉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乡土情结。特别是课程设置了“我为家乡献一策”的实践环节，引导学生结合调研成果提出古城垃圾分类改进、文旅文创产品设计等建议，部分方案已被当地文旅部门采纳落地；而从犍为走出去学有所成的学生中，不少人选择了回归古城，投身于家乡的文化保护、江河生态治理、非遗技艺传承等领域，真正成长为“留得住、用得上”的乡土人才。由此可见，在地化课程与教学不仅是乡村教育提质增效的实践路径，更是连接教育公平与乡村发展的关键纽带。

乡村教育是教育公平的短板，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在地化课程与教学，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与效能，培养服务于乡村建设的人才。犍为县的实践表明，在地化教育不仅可行，而且有效。我们应当推广这一经验，推动乡村教育的改革发展。他主张乡村教育应当注重实效的提升，通过实效的提升来促进乡村的振兴。

（3）融合正式与非正式教育

在地化教育天然地模糊了学校与社区、课堂与社会的界限。它能有效整合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遗址、生态保护区、企业、农场等多样化的潜在学习场域和乡土专家资源，采用项目式学习（PBL）、社区服务学习（CSL）、田野调查等丰富形式，让学生在真实的本土情境中自主探索、发现问题、合作寻求解决方案，使学习过程更具开放性、实践性和生命力。四川犍为文庙内开设的“李拔馆”，充分利用一代先贤李拔留下的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为官之道等珍贵文化遗产，吸引了广大的党员干部，学生，群众前来参观学习。

内容丰富的在地化教育让学校与社区、课堂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

教育不仅仅发生在学校，更发生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融合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可以拓展学习的空间与资源，提升教育的效果。李拔馆的开设，为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我们应当鼓励学校与社会资源的对接，构建开放多元的教育体系。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资源的整合，通过资源的整合来提升教育的效率。

（4）增强地方认同与文化自信

通过系统化的在地化教学，学生得以深入了解本地独特的历史脉络、文化传统、生态智慧与当代发展现状。这能有效培育其深厚的乡土情怀、强烈的地方归属感和对自身文化根源的认同感、自豪感（文化自信），特别是犍为“在地化”教育自愿者们，以本地一代循吏李拔的优秀家风家训谱写的《黄旗坝》《犍为文庙》等歌曲，以李拔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编排的川剧《榕荫记》获2025年四川省川剧汇演三等奖，为地方文化的自觉传承与创新性弘扬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和情感基础。

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基础。通过在地化教育，可以增强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与自信，进而提升对整个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犍为的教育志愿者们通过创作歌曲等形式，传播地方文化，增强了文化的影响力。我们应当重视地方文化的挖掘与传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文化的认同，通过文化的认同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5）激发内生学习动力

将学习内容与学生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化、社区紧密联系，创设真实、具体、有意义的学习情境和挑战，能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内在探究欲望和作为社区一员的主人翁意识，使学习真正成为主动、持续、有机且自发的过程。

学习动力的激发是教育成功的关键。通过在地化教育，可以将学习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使学习变得更加有趣与有意义。这种内生的学习动力，比外在的奖励与惩罚更为持久与有效。我们应当注重学习情境的创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动力的激发，通过动力的激发来提升学习的效果。

（6）回归育人本质

李拔对“焕乃宫墙”这一哲学命题中多维度的“表面维新可能实质守旧”③进行批判，为当代教育提供了祛魅的镜鉴。当前教育场域中，“魅影”体现为对校园的占地面积、豪华设施、升学率、量化指标的盲目追逐，这些常被误读为教育实力与质量的核心，却掩盖了教育中真实的情感联结与生命成长。如果只追求“焕乃宫墙”没有精神与人才层面的深厚底蕴，其学校的本质便偏离了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初衷。因此，对一所学校而言，先进的硬件设施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其高度与影响力的，是师资水平、

学术成就、人才培养质量以及精神文化的积淀。李拔对“焕乃官墙”进行批判的理念提醒我们，评价建设学校应注重内涵式发展，回归育人与学术创新的本真使命。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而不是竞争与排名。李拔的思想提醒我们，要回归教育的本真，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与精神发展。我们应当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引导学校注重内涵建设，提升育人质量。他主张教育应当注重本质的回归，通过本质的回归来实现教育的价值。

6.2.2 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

(1) 促进文化多样性与在地文化复兴

在全球化浪潮中，在地化教化倡导珍视并发扬地方特色文化，鼓励对本土知识、技艺、语言、艺术形式的挖掘、保护与创新。这推动地域文化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独特价值，避免文化同质化。不同地区在地文化的繁荣与相互交流，有助于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丰富多元、包容和谐的文化生态。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通过在地化教化，可以保护与传承地方文化，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我们应当鼓励地方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使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现独特的价值。他主张文化应当注重多样性的保护，通过多样性的保护来促进文明的进步。

(2) 助力地方可持续发展

在地化教化培养的是“接地气”的人才——他们了解本地的优势、短板、历史与潜力，热爱乡土，具备服务地方的社会责任感。这类人才更倾向于扎根地方、参与地方建设，能够为地方的经济（如特色产业发展）、社会（如社区治理）、文化（如文旅融合）、生态（如环境保护）等各领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持和内生动力，是落实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力量。

人才是地方发展的关键。通过在地化教化，可以培养服务于地方建设的人才，推动地方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当重视地方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为地方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他主张人才应当注重地方的服务，通过地方的服务来实现人才的价值。

6.2.3 对学科理论发展的意义

丰富全球化与地方化关系研究：“全球在地化”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分析框架。李拔的“在地化教化”实践及其理念，为理解全球化进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同质化与异质化、中心与边缘之间复杂而动态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案例和理论滋养，有助于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李拔的思想为相关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视角。我们应当加强对李拔教育思想的研究，推动相关学科理论的发展。他主张理论应当注重实践的支撑，通过实践的支撑来提升理论的水平。

6.2.4 对政策与制度创新的意义

(1) 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地方性知识

在地化教化的具体实践探索、经验总结以及面临的挑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来自地方一线的、鲜活的“地方性知识”^⑧。这些反馈信息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精准地洞悉不同地区教育的真实需求、资源禀赋与实际状况，从而制定出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地方教育政策，避免政策“水土不服”。

教育政策的制定应当基于地方的实际情况。通过在地化教化的实践，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应当加强地方教育经验的总结与推广，推动教育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他主张政策应当注重地方的需求，通过地方的需求来提升政策的实效。

(2) 推动教育制度的弹性化与适应性改革

推广“在地化教化”理念，必然要求教育制度在多个层面进行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改革：课程体系需预留足够的“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空间；教学评价标准需容纳多元化的在地化学习成果；教师培养需加强引导教师开发利用在地资源的能力；学校管理需赋予更多因地制宜的自主权。这种倒逼机制有助于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更具弹性和活力的教育生态，以满足不同地区多样化的发展需求，避免教育的“一刀切”。

教育制度的改革应当适应地方发展的需求。通过推广在地化教化理念，可以推动教育制度的弹性化与适应性改革。我们应当赋予地方与学校更多的自主权，鼓励教育创新。他主张制度应当注重弹性的设计，通过弹性的设计来适应发展的需求。

7 结语

7.1 李拔教育智慧的历史定位与文明赓续价值

李拔在其新建或维护修缮的诸多县学中留下的碑刻，虽历经风雨沧桑，有些字迹或已斑驳漫漶，但其碑石之上、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教育智慧却早已深刻嵌入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脉络之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李拔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他个人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蕴含着文明的基因，对于当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重视李拔教育思想的研究与传承，使其在当代教育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7.2 “教化—治理—文明”三位一体框架的核心要义

其思想精髓——对教育本质的清醒认知（祛魅物质主义，回归精神丰盈）、对士人精神向度的双重塑造（“去私”以净化个体道德、“近圣”以建构价值坐标）、以及对文明传承路径的务实探索（通过“在地化教化”实现“知行合一”），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自洽、实践导向的“教化—治理—文明”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教化是根基，旨在培育具有道德自觉

和实践能力的个体(士人);治理是延伸,强调教化成果应用于服务地方、改善民生(“处为正士”、“出为良臣”);文明是旨归,通过有效的教化与治理,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保障文明的生生不息。

这一框架的构建,体现了李拔教育思想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不仅关注个体的成长,更关注社会的治理与文明的传承。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当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当加强对李拔教育思想的研究,推动当代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7.3 应对当代挑战:李拔思想作为历史坐标与智慧源泉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并深刻重塑知识生产方式、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入并不断挑战文化认同、教育领域面临资源分配、价值迷失、知行合一脱节等多重困境的当下,李拔超越其时代的教育哲学,为我们反思教育的本真意义、重构教育的核心价值、探索教育应对时代挑战的有效路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坐标与深邃的智慧源泉。李拔的思想,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应当汲取李拔思想的智慧,应对当代教育的挑战,推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7.4 传承启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教育体系

解码并传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汲取其超越时空的启示——特别是对精神价值的坚守、对知行合一的追求、对在地化实践的重视——对于扎根中国大地、融通中外古今、面向未来挑战,构建兼具深厚民族根基与鲜明时代精神,能够有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中国式现代化教育体系,都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李拔的思考与实践,提醒我们教育的终极使命,始终在于点亮心灵、塑造人格、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教育体系,需要汲取历史的智慧。李拔的教育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我们应当加强对李拔教育思想的研究与传承,使其在当代教育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主张教育体系应当注重历史的传承,通过历史的传承来提升体系的内涵。

7.5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7.5.1 研究局限

(1) 史料挖掘的广度与深度不足

本研究以《修福鼎县学记》^①《请教民开山种树议》^②等已整理著述、碑刻为核心史料,但李拔散佚于各地的公文、书信、家训等民间藏本尚未全面搜集;部分碑刻因风化造成文字残缺,其教育思想细节的解读仍有拓展空间。同时,研究对乾嘉时期其他地方官员的教育实践涉猎较少,难以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凸显李拔教育思想的独特性。

史料的局限是历史研究常见的问题。未来应当加强对李拔散佚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以便更全面地了解其教育思想。同时,也应当加强对同时代其他官员教育实践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定位李拔思想的历史地位。我们应当重视史料的

挖掘,为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2) 研究视角的维度有待拓展

本文以“思想根源-实践路径-当代价值”为核心分析脉络,侧重探讨教育思想与地方治理的耦合关系,但对李拔教育思想的跨区域传播路径研究不足,尚未对比其在福建福宁、湖北荆宜、湖南长沙等任职地的实践差异;且研究多聚焦儒家教化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对其教育思想与当时商业文化、宗族文化的互动关系缺乏深入探讨。

研究视角的拓展有助于深化对李拔教育思想的理解。未来应当加强对李拔跨区域实践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其思想与当时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我们应当注重视角的多元,为研究提供丰富的维度。

(3) 理论融合的深度仍需加强

本研究引入记忆之场^③、在地化等理论工具解析李拔教育实践,但将其“教化-治理-文明”三位一体框架与现代教育治理理论、乡村振兴理论的深度对话存在欠缺,尚未构建出系统性的本土化教育理论模型,理论提炼的抽象度与普适性有待提升。

理论融合的增加有助于提升研究的学术价值。未来应当加强对李拔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理论的对话,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模型。我们应当注重理论的创新,为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

7.5.2 未来展望

(1) 深化史料整理与考证

联合地方档案机构、文博单位及民间收藏组织,系统性搜集李拔散佚的著述、公文、碑刻拓片与地方志文献,建立“李拔著述文献数据库”;运用金石学、文献学方法对残缺碑刻进行校勘补遗,厘清其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脉络,为后续研究夯实史料基础。

史料整理是研究的基础。未来应当加强对李拔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为研究提供坚实的支持。我们应当重视基础的工作,为研究提供可靠的保障。

(2) 拓展跨维度、跨区域比较研究

开展李拔任职地教育实践的区域比较研究,分析其在闽东、江汉、湖湘等不同地域文化语境下的教育策略调适,揭示地域文化对儒家教化思想的塑造作用;同时,将李拔教育思想与陈宏谋、郑板桥等同时代循吏的教育实践进行对比,提炼清代地方官员经世致用教育思想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

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李拔思想的独特性。未来应当加强对李拔跨区域实践的比较研究,以及与其他同时代官员的对比研究。我们应当注重比较的方法,为研究提供广阔视野。

(3) 加强理论融合与创新

推动李拔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理论的双向赋能,将“在地化教化”“去私近圣”等核心理念融入乡村教育振兴、地

方高校特色发展等现实议题,构建兼具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的本土化教育治理理论框架;引入量化研究方法,选取犍为、福鼎等地的在地化教育实践案例开展实证调研,以数据佐证李拔教育思想的当代实践价值。

理论融合与创新是研究发展的方向。未来应当加强对李拔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理论的融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我们应当注重理论的实践,为研究提供现实的意义。

(4) 推动学术研究与实践转化联动

依托“犍为李拔研究会”平台,搭建“高校-地方政府-中小学”产学研合作机制,将李拔教育思想融入乡土教材开发、研学旅行设计、非遗传承课程建设等实践场景;举办“李拔教育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教育体系构建”学术研讨会,促进学术成果向政策建议、教学实践转化,实现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

学术研究与实践转化的联动,有助于发挥李拔教育思想的现实价值。未来应当加强对李拔教育思想的实践应用,推动其转化为具体的教育政策与教学实践。我们应当注重转化的效果,为研究提供实际的价值。

(5) 彰显教育思想的独特价值

李拔的教育思想,是儒家教化传统与乾嘉经世致用学风深度融合的产物,也是其在各地地方治理实践中不断调适的结果。其“以生养教”“在地化教化”的核心理念,不仅体现了清代循吏的治理智慧,更为当代乡村教育振兴与地域文化活化提供了重要启示。尽管本研究在史料挖掘与理论融合方面存在局限,但随着李拔散佚文献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视角的拓展,其教育思想的独特价值将得到充分彰显。

李拔教育思想的独特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与传

承。未来应当加强对李拔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宣传,使其在当代教育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应当注重价值的彰显,为研究提供持久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 李拔. 修福鼎县学记 [G]// 福鼎县志·艺文卷. 乾隆年间刻本.
- [2] 李拔. 请教民开山种树议 [G]// 宁郡志·艺文志. 清乾隆三十五年刊本.
- [3] 李拔. 寻孔颜乐趣说 [G]// 犍为县志·文征卷. 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 [4] 宁德市社科联、省研究中心宁德实践基地办. 奋力谱写“宁德篇章”研究 2025卷[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25.
- [5] 四川省犍为县教育局. 乡土课程开发与实践: 犍为在地化教育案例集 [M]. 乐内印(2005)字第080号.
- [6]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M]. 黄艳红,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7] 檀传宝. 立德树人的逻辑与实现路径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9] 陈宏谋. 培远堂偶存稿 [M]. 清乾隆年间刻本.
- [10] 郑板桥. 郑板桥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11] 李拔. 东溪文集 [M]. 清乾隆年间刻本.
- [12] 犍为县志编纂委员会. 犍为县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0.
- [13] 福鼎县志编纂委员会. 福鼎县志 [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5.
- [14] 教育部. 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Z]. 2019.
- [15]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Z]. 2019.